
September 2012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Wit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u Shih's Vernacular Literature

Xiaoling Li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Li, Xiaoling. 2012.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Wit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u Shih's Vernacular Literature."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2, (5): pp.21-28.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2/iss5/2>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作为学科的中国民间文学

——兼及对胡适白话文学的新阐释

李小玲

摘要:本文以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时期的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结合史实判断,对民间文学学科研究对象进行梳理和研讨。通过对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解析,首先明确民间文学学科的文学定位,其次揭示学科形成背后的思想主导,最后对白话和白话文学作出新的阐释,从而在历史和当下的双重维度下,对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作更全面和客观的评述。

关键词:民间文学学科 胡适 白话文学

作者简介:李小玲,文艺学博士,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研究方向为文艺民俗学、民间文学。电子邮箱:lilxl@hotmail.com 本文为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二十世纪初民间文学研究及当代意义——以胡适的民间文学理论为例”[项目编号:11BZW092]阶段性成果。

Title: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With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Hu Shih's Vernacular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paper takes as its departure the three keywords prominent during the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period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nd proceeds to investigate the subject of folk literature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n the basis of an analysis of Hu Shih's "Vernacular Literature Movement," the paper tries to locate the discipline of folk literature in literary study, describe the governing idea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provide a fresh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nacular language and the vernacular literature. It is hoped that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can be surveyed in a more comprehensive and objective way from both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Key words: folk literature as a discipline Hu Shih vernacular literature

Author: Li Xiaoling, Ph. D. in Theories of Literature and Art,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ith a research focus on folklore and folk literature. Email: lilxl@hotmail.com

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多维的动态的概念,历来纠缠不清,众说纷纭,在学界有种种不同的观点。D. G. 霍夫曼评述:从“科学的”确切定义到更为宽泛松散的界定——认为它囊括所有的主题和符号(转引自玛丽·艾伦·布朗87)。理查德·鲍曼认为“‘民间文学’一词虽然更为常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5)。肯普·巴特尔甚至感叹:“这一术语令人捉摸不透,就连那些自鸣精通的学者也未免闹笑话”(173)。

其实,民间文学自古就有,汉代学者就有不少关于采诗方面的记载。据《孔丛子·狩猎篇》载:“古者天子命史采歌谣,以观民风。”《礼记·王制篇》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班固《汉书·食货志》

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采诗制度虽然在客观上促成了民歌的收集和保存,但仅是作为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汉书·艺文志》),根本上并没有将民歌本身作为学科研究的对象,对民歌的关注还没有转化成对象化的民间文学学科意识,换言之,民间文学在那时还仅是作为统治者掌握民情的一种途径和方式,还没有上升到研究主体的地位,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身份还没有确定。

民间文学以学科面目出现始于现代。正如钟敬文所说:“民间文艺的断片的、部分的理论方面的探究,可说是‘古已有之’的了。但它的研究的科学化,却还是很新近的事”(4)，“民间文学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才出现和流行的”(70)。

虽然民间文学作为学科的身份是确立了,但它的研

究对象却并没有随之明朗化和清晰化。民间文学概念首见于1916年梅光迪给胡适的一封信,“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胡适,“全集”18:109)。作为一个外来词,民间文学所指的内涵还很宽泛,并没有明确的边界,这从梅光迪括号里的解释就可见出。

在学界,folklore兼有民俗学和民间文学的双重内涵。一如杨丽慧、安德明所说:“英语中的‘folklore’一词,有两重含义,它既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又是指研究民俗的学问,即‘民俗学’”。但“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惯常的理解中,folklore都被看成了与中文‘民间文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①在中国,“folklore”概念的引入和民间文学同步,且是作为民间文学概念的一个注脚和对应,这与美国民俗学界的实际研究情形类似。“folklore”的双重含义为民间文学学科的未来发展留下了极大的裂隙,美国学界一直就有着两条线的发展,以前的重心偏向文学,现在则更趋向于民俗学的研究。中国学界也是如此,一直存在着文学与民俗两条理路的交织,自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进行专业调整后,关于民间文学学科应该纳入民俗学学科部属之下,还是与民俗学学科各自为政,其争议逐渐公开化和激烈化。^②其实,早在学科形成之初,“folklore”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就已预设了这种争议和偏向的不可避免。

梅光迪对“民间文学”作的第二个解释是“popular poetry”。“popular”一词在汉译中,对应于民众的、大众的、受欢迎的、普通的、广为流传的、流行的、通俗的等多种语义。刘复(半农)在《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一文中,就特别解释了“通俗小说”的概念,认为对应于英文中的“popular story”,“英文‘popular’一字,向来译作‘普通’或译作‘通俗’,都不恰当,因为他的原义是:1. suitable to common people; easy to be comprehended; 2. Acceptable or pleasing to people in general. 若要译得十分妥当,非译作‘合乎普通人民的,容易理会的,为普通人民所喜悦所承受的,’不可”(1-10)。但刘半农认为此说法太麻烦,于是借用“通俗”二字,“是取其现成省事。”由此可见,以“通俗”翻译“popular”仅是权宜之计,两者并非完全划等号。就他所解释的“通俗小说”来看,包括“上中下三等社会共有的小说。”不过,刘半农又特别指出,通俗小说不同与文言小说相对的白话小说,但肯定“通俗小说当用白话撰述,是另一问题。”但饶有意味的是,美国当代著名电影研究理论家汉森则舍弃了“popular”一词,认为它所指涉的意义在更大层面上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操纵,而主张以“白话”一词予以取代,并明确说这是受到白话文运动的启发。关于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展开论述。在此,还须引起注意的是“poetry”一词,“poetry”由诗歌而泛指一切文学,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定位是文学,而非别的。这等于又在某种程度上回应了“folklore”的学科定位

问题。

梅光迪对民间文学的第三个解释是:spoken language,即口语。这和胡愈之概括的口述的文学(oral literature)有相通之处,但还是有所差异。两者都强调文学的口头性特点,但口述的文学是相对于书本的文学(book literature)而言,即是非文本化的文学。一者是指文学的语言特色,一者是文学存在的样式而论,前者可以运用于“物化”(文本形式)和“活化”(非文本形式)的两种文学载体,它指涉着一个更大的文学空间。

理查德·鲍曼还曾就“spoken”和“oral”词语的含义作过细微的辨析。他认为“spoken art”(言说艺术)比“口头艺术”(verbal art)或“口头文学”(oral literature)更好一些,更有一种在场感和情境感。这些词比之“民间文学”一词都更为妥当,“‘民间文学(folklore)’一词虽然更为常用但也存在不少问题”。“虽然在‘民俗学’的名称之下人们研究了许多事物,但是口头艺术一直是、或者接近是这一更广泛的学科领域的中心,并且构成了运用人类学视角的民俗学者(anthropological folklorists)以及其他领域学者之间的一个主要共同领地”(鲍曼5)。鲍曼之所以强调“spoken”,是为了凸显艺术的活态性和口语化特点,以符合民间文学表演性特征,由此打破了过往将研究对象静态化和固态化的局限,研究视域发生转换和拓宽。其实,梅光迪选择“spoken language”一词,就包含有鲍曼所提到的动态感和表演性特质,遗憾的是这一点并没有引起相关学者的关注。

因为梅光迪没有对民间文学这几个概念的内涵作具体的阐释和解读,所以,历来也没能引起学界对这几个释义的英文词语给予足够的重视。但就是这几个充满歧义性和多义性的英文词语却构成了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时期的关键词,而对这些关键词的解析至今也没能达成统一的认识。这也是导致目前民间文学学科处境尴尬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

李川提到,“如果追究民间文学的学科起源的话,只能追索到西方,而不宜从中国本土资源寻找其学科萌芽或者学术渊源。”因为民间文学“直接的学科来源正是西方的现代化”(10)。这样的判断似乎有一定的道理,就如梅光迪选择外文进行注释,也有可能是因为一时难以找到与之相匹配的中文词。但此论断也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概念在不同情境下的差异和变化,“一个观念或一种理论从此时此地向彼时彼地的运动是加强了还是削弱了自身的力量,一定历史时期和民族文化的理论放在另一时期或环境里,是否会变得面目全非”,这些都是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因为“进入新环境的路绝非畅通无阻,而是必然会牵涉到与始发点情况不同的再现和制度化的过

程。这就使关于理论和观念的移植、转移、流通以及交换的所有说明变得复杂化了”(赛义德 138)。所以,要廓清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关键词的迷雾,还有必要重新回到概念输入背后的特殊语境之中。

梅光迪输入“民间文学”概念是有来由的,缘起于与胡适之间的一场争论。1915年9月17日,胡适送给梅光迪一首长诗:“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诗中首次出现了“文学革命”的名词。围绕着文学革命,胡梅两人常有书信讨论。1916年3月,胡适信中谈及宋元白话文学的重要价值,于是,就有了我们前面所引述的梅光迪的那封回信:“来书论宋元文学,甚启聋聩。文学革命自从从‘民间文学’(Folklore, Popular poetry, Spoken language, etc.)入手,此无待言。惟非经一番大战不可。骤言俚俗文学,必为旧派文家所汕笑攻击。但我辈正欢迎其汕笑攻击耳”(胡适,“全集”18:104-09)。

这段史实至少给我们透露了以下几个信息:一是梅光迪引入概念的目的是为了比照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是和文学革命即白话文学运动紧密勾连,且与俚俗文学互通,梅光迪提到的“Popular poetry”和“Spoken language”是对文学革命内容的诠释,同时也说明民间文学、白话文学和俚俗文学之间有某种内在的契合点,而这个契合点也就关涉到民间文学学科的基点和关键所在。

二是民间文学为一外来概念,这个名称和它所命名的内涵均出自西方,但概念的引入并不是单纯的学科输入,而是切合中国的实际需要,这就涉及到概念嫁接过来后和中国本土学科对象之间的一个恰适度和黏合度问题。外来的背景不容忽视,但全盘以西化的概念和内涵来界定中国民间文学学科的特征和本质显然也是不合时宜的。

三是胡梅两人在文学革命自民间文学始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对民间文学于变革文学的意义和作用的认知趋同,并非一般传统理解上的两者在文学诸观点上的水火不容。换言之,梅光迪对胡适白话文运动的内在本体是熟悉和予以肯定的,只是对“白话取代文言”的提法难以接受。由此可见,作为白话文学运动中的“白话”的意蕴并不完全对等于作为语言层面上的“白话”一词,这就事关到对“白话文学”的认识问题,也事关到对民间文学作何种理解的问题。

很显然,梅光迪几个有关民间文学学科关键词的后面有着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背影,因此,我们不能随便逾越这一特定背景。不过,还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梅光迪早于1915年引入了“民间文学”概念,但概念的输入还不等同于学科的建立,因为学科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命名和下定义的方式。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起自于1918年2月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的成立,即由刘半农、沈尹默等人倡导的歌谣征集运动,学界对此已达成共识。

我们以往很关注歌谣征集运动的时间点和发起人,但很少追问引发此事件背后的成因,即此次歌谣征集活动何以能取得成功?刘半农又何以能作为发起人?歌谣征集活动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些其实都关涉到民间文学学科的定位和走向问题。笔者以为,歌谣征集活动的成功除了有北大标杆的旗帜之外,也有在时间节骨眼上的恰逢其时,更为主要的是歌谣征集运动是对文学革命运动的一种声援乃至延续和深入。早在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局月刊》第4号登载《采集儿歌童话启》:“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财。”周作人因人类学之兴趣收集歌谣,目的在于为民俗学研究提供资料,但国内当时对人类学、民俗学尚感陌生,所以应者寥寥,统共收到1篇来稿,而且与寄稿者还彼此认识,征集运动以惨淡收场。但到了1918年,由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已成燎原之势,刘半农也是当时文学革命的一员主将,1917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1917年10月他给钱玄同的信中自诩自己,还有陈独秀、胡适和钱玄同为文学改良之“台柱”,且“当仁不让”。刘半农认为“歌谣中也有很好的文章”(“外国民歌译自序”11),于是提议征集,北大歌谣征集活动的序幕就此拉开,正如陈咏超所说“由胡适倡导的创作白话诗的风气,却在不经意间引发了现代歌谣运动”(56)。

从梅光迪民间文学概念的输入到刘半农征集歌谣活动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标识性开端,都可以回溯到同一个原点,即文学革命,也就是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文学运动。因此,在谈论民间文学学科对象问题时,就不能不正视白话文运动。胡塞尔提出“面对实事本身”,认为“研究的动力必定不是来自各种哲学,而是来自实事与问题”(69)。以往我们更多地是从民间文学概念或理论入手来谈论学科,过于倚重外来学术的理论支持,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概念和理论背后的内在支柱和潜在制约,将研究对象本体放置于从属的地位,甚至有一种疏离之感。“但是实践先于理论,工匠艺术家更要走在哲学家的前面。先在艺术实践上表现出一个新的境界,才有概括这种新境界的理论”(宗白华 36)。中国民间文学作为学科意义的出现并非是概念和理论本身的衍生物,乃是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附属品,作为一背景材料和学科的实践展演,我们将无法漠视它的客观存在。况且,研究对象是有身份的,事物对象本身将规约我们的视野。因为“一门科学的所有专题对象都以事质领域为其基础,而基本概念就是这一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这一领会引导着一切实证探索)的那些规定。所以,只有相应地先行对事质领域本身作一番透彻研究,这些基本概念才能真正获得证明和‘根据’”(海德格尔 12)。实际上,这里就涉及到民间文学研究的两条理路,一是学科概念和理论的辨析、演绎,一是关于事质领域的分析,前者常

被论及,后者却屡被遗忘,论说起来,两者不可偏废。如果没有概念和理论的整理和系统的阐释,就不会有学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但如果缺失先行的对事质领域本身的开掘和研讨,也不会有学科存在的合理性和可能性。因此,挖掘胡适白话文学运动的内在立意,也将使梅光迪的民间文学学科关键词获得证明和根据。

三

海德格尔认为,学科首先应该思考自己研究对象的性质或特征,并且考虑“如何赢得和保证那种本源的方式,借以通达应当成为这门科学的对象的东西”(12)。

确切地说,胡适对民间文学学科本身并没有更多的兴趣或有意为之的初衷,他更多的是出于文学革命的目的。因此,学界不太将民间文学学科与白话文学相勾连,近些年这一现象有所改观,已有学者会将白话文学与民间文学并举,但更多的是自动归位,然胡适提倡白话文学毕竟不是基于明确的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所以,两者之间还是存有罅隙的。不过,胡适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善于将个体的文学经验“转化成智性的(intellectual)形式”,并“将它同化成首尾一贯的合理的体系”(韦勒克3),且兼有学理上的价值判断,使其成为关于文学的一种知识或学问,却恰适海德格尔赋予学科研究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和学科进展应有的学术思路。

笔者以为,这应该和胡适的学术路数和学术理想有关,他强调“实验是检验真理的试金石”,“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全集”1:324)。因此,他并不热衷于进行概念上的理论运思和哲学上的抽象演绎,也无意于西方学科概念和理论的框定,尽管他有哲学的背景和功底,但他更愿意作一些史料整理和事实判据,并将其奉为“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海德格尔认为,科学研究始终侧重于实证性,但研究的进展却主要不靠收集实证研究的结果,而“主要靠对各个领域的基本建构提出疑问,这些疑问往往是以反其道而行之的方式从那种关于事质的日积月累的熟知中脱颖而出”(海德格尔11)。胡适坚持“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重新考量中国文学史,提出“双线文学史观”,撰写《白话文学史》,“使看不见的东西可见”(福柯转引自斯皮瓦克105),都昭示着文学观念的重大转折和文学史的重新书写,可谓石破天惊。潜藏的“新”文学命题预设了民间文学作为“科学”存有的根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民间文学由此“浮出历史地表”并非历史性的偶遇。就笔者看来,胡适对民间文学的学科意识并不是比照我们传统观念上的以西方概念或以某一理论为先导,而是以事实为判据,以史实为根柢,是“依其所追随的事物来界定和解释的”(马尔库斯24),也可以说是另一个层面上的更为自主的学科意识。当然,如前所述,他的这种学科意识并不是那么纯粹,还兼有思想变革的成分。

为了挖掘胡适关于“事质领域借以事先得到领会的那些规定”,同时也使梅光迪关于民间文学学科关键词获得证明和根据。下面围绕着几个关键词展开论述。

(一)民间文学学科定位

要建立一门学科,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确立学科研究对象问题,这也是梅光迪提到的第一个关键词“folklore”。

自歌谣研究会成立伊始,学界就有着民俗和文学两派,刘半农“始终是偏重在文艺的欣赏方面的”(“外国民歌译自序”11)。周作人强调“歌谣是民俗学上的一种重要的资料[……],这是第一个目的”(“论集”98)。胡适则以语言进行切分,并梳理出白话文学一条主线以抗衡于中国传统文学,且主观上强调民间文学学科的文学定位,^⑧和钟敬文由民间文学逐渐转到民俗学的研究路数不同,胡适的此种判断和认知前后大体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并且曾在不同场合对其文学的归属作过反复的强调。从1922年的《北京的平民文学》(胡适,“全集”2:833)到1936年的《歌谣》复刊词均有体现:“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全集”12:329)。

陈友康将胡适的观点归纳为“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肯定这“对我们今天思考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依然具有启示作用”(107)。这样的分析颇有见地,基本上符合胡适对民间文学的学科判断。我们常常将白话文运动归之于语言变革运动,却从根本上忽视了它的成功首先得益于是一场文学运动,是在文学的层面确立和提升了白话的地位,而中国民间文学学科也正是在这一起点上获得支撑和发展。

德里达认为应保持学科间的交流,要跨越学科间的界限,以建立新的主题和新的问题意识,寻找研究新问题的方法与进路,但又特别强调“学科界定的重要”,提醒不要让学科“消融在别的学科之中”(43)。学科交叉研究是当今学科发展的一大趋势,很多学科都在自我扩张、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占有相关地盘和领地,但在开拓新的疆域的同时,也不应该遗失学科的原初点和起点。学科的领会必须有自我的概念、对象和身份,这是学科学术化和科学化的必经之路。

互为交叉和渗透是人文学科的一大特点,但并不能因此就消弭了本学科的根基。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信中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的创作,认为“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诸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从中我学到了比一切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所学到的还要多”(684)。尽管如此,但并不说明我们就应该将巴尔扎克的小说视为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类的书籍,小说呈现出的诸种价值并不意味着它作为文学之存在形式的位移和转换,

这实际上就涉及到学科领域的互为衍射问题。就如韦勒克所说：“倘使研究者只是想当然地把文学单纯当做生活的一面镜子、生活的一种翻版，或把文学当做一种社会文献，这类研究似乎就没有什么价值”（107）。当今民间文学学科陷入困境，就和学科的定位不清有很大的关系。而民间文学在国家学科体制中的位移和降级，不仅仅是使“学科的独立性丧失，学科发展愈发艰难”（江帆），更令人担忧的是变化背后所隐含的事关民间文学文学价值的评价问题，因为这势必影响到学科存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胡适反复强调对民间文学学科作文学的归位，自有他学术上的细察和审视，或许应引起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足够重视和重新思考。

（二）白话文学

白话文学与“古文文学”相对，也被胡适称为“活文学”和“国语文学”。对应于刘半农将“Popular”翻译为“通俗”，“Popular poetry”则可译为“通俗文学”。就刘半农来说，白话文学对应于古文文学，通俗文学当用白话来写，但还是不同于白话文学，看来他还是把白话仅当作语言工具。而梅光迪的态度则有所不同，他用 Popular poetry 解释民间文学，又将民间文学与俚俗文学和白话文学并举，可见他并没有将白话文学简单地视为用“白话”书写的文学，也就是说没有将白话工具化，俚俗文学其实也就是俗文学，由是观之，梅光迪对民间文学的理解似乎更为宽泛一些。

胡适一般将以白话写就的文学称为“通俗文学”，但并不等同于民间文学。在《白话文学史》中，他将文学分为民间文学、俗文学和上流文人文学三大类，他说：“大概西汉只有民歌；那时的文人也许有受了民间文学的影响而作诗歌的，但风气未开，这种作品只是‘俗文学’，《汉书·礼乐志》哀帝废乐府诏所谓‘郑声’，《王褒传》宣帝所谓‘郑卫’，是也。到了东汉中东叶以后，民间文学的影响已深入了，已普遍了，方才有上流文人出来公然仿效乐府歌辞，造作歌诗。文学史上遂开一个新局面”（“全集”11：260）。

因“郑声淫”，“郑卫之乐，皆为淫声”，所以，胡适将有低级趣味、格调不高，由下等文人写就的文学归入“俗文学”，以保持民间文学的纯洁和高贵，并提出“民间的白话文学”即等同于民间文学以剔除一般的白话文学。周作人在《关于通俗文学》一文中将文学分为三部分：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和纯文学（“论集”305），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则分为纯文学、通俗文学和原始文学，民间文学即原始文学，“原始文学是由民间自己创作出来的”，通俗文学是“先为士大夫所作，然后流传于民间”（6-7）。也是有意的将民间文学与通俗文学相剥离。这样的分类虽然可能有个体创作与集体创作，或者是口头创作和文本书写之区分的考虑，但更为主要的是基于思想上和情感上的价值评判。

顾颉刚就曾谈到知识分子的这种心态：“不幸北大同人只要歌谣，不要唱本，以为歌谣是天籁而唱本乃下等文人所造作，其价值高下不同”（1）。这其实就涉及到情感的价值判断问题，将通俗文学从民间文学中抽离更多的是出于文学革命和思想变革的需要，因为通俗文学中含有低级、颓靡、迷信等思想低下的杂质，不合他们对理想文学的想象，所以，要从民间文学中予以清除，这显然带有个体主观的评判性，而非客观的学术检讨。其实，民间本来就是有容乃大，精粹与糟粕兼而有之。

作为一种概念表述，所谓白话文等同于国语，白话文学等同于国语文学，实际上是一个依据想象而建构的概念。斯皮瓦克将“人民”和“底层阶级”用作同义词，认为其“本身就被限定为不同于精英的一种差异”，“底层主体并没有说话的空间”，“底层人主体只是民族主义精英编织的主导话语的产物”（104）。换言之，作为学科意义上的民间文学更多的是精英主体出于文化建构的想象之物。

胡适的贡献在于他发现了民间文学作为文学存在的独特性并挖掘出来，但受制于文学革命的要求和策略，他将净化后的民间文学推向前台乃至正统，甚至予以取代传统文学，这就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一个偏见导致另一个偏见，也难以获得对文学的一个总体概念，其主观性也导致了文学评价客观性的缺失，带来了另外一种遮蔽和无视。

（三）白话

白话是相对于文言而言的，据胡适解释：“‘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全集”11：212）。概括起来，白话有说话、简单、清楚的意思，相当于口语化的语言，这与梅光迪提到的“Spoken language”倒是基本吻合，接近于鲍曼提到的“言说”。

美国著名学者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将新文化运动的“白话”一词与“现代主义”对接，提出了“白话现代主义”概念。她选择“白话”，是因为“‘白话’一词包括了平庸、日常使用的层面，具有流通性、混杂性和转述性，而且兼具谈论、习语和方言的意涵”（“大批量生产”125）。她还提到，尽管“白话”（vernacular）词义略嫌模糊，却胜过“大众”（popular），后者受到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决定（over determined），而在历史上并不比“白话”确定（“堕落女性”44-45）。译者在注释里特别说明，汉森使用“vernacular”（白话）一词，除了基于这一语汇在西方历史文化中的诸多涵义，同时也受制于对中国五四白话运动的重新认识的重要影响，尤其强调“vernacular”（白话）在语言学上实体层面和寓意层面的双重内涵。汉森关于白话现代主义的两篇论文在美国当代电影研究中产生了相当的影响，为此还召开过“白话现代主义”专题国际学术研讨会。

这是一件很值得玩味的事情,当我们大量借鉴和引入西方的术语、理论和方法,并感觉不借助于西方的术语和思维方式就难以进行思考之时,美国学者却舍弃西方诸多固有的语言选项,单挑“白话”一词,意义不言而喻。西方学者常认为中国的语言缺乏语法概念,缺乏抽象思维,黑格尔甚至声称“象形文字的阅读是一种聋读和哑写”(张隆溪 36)。然汉森却从浩瀚的汉语词汇中找到了“白话”一词,并透析出其中所包含的日常与言说的二重性,且以日常和言说为圆心辐射到更大的空间,从而跳脱了“白话”作为单纯的语言符号,用“一种以物质形式接近思想的方法”(巴洛文 101),把捉住符号背后的深意,进而将“白话”与“现代主义”对接,赋予了“白话”概念的现代性和现代主义因子,传统的词语由此获得了重新阐释的可能。

汉森提出“白话”概念确实为我们理解“白话”本身打开了新的窗口,也为我们重新认识民间文学学科研究对象提供了启示。我们以往更多的是从语言工具的层面构型“白话”的意义,将白话文学作为语言工具变革的代名词。姑且不论语言从来就不是作为孤立的存在,本身承载着太多文化的内涵。因为“语言不像石头一样仅仅是惰性的东西,而是人的创作物,故带有某一语种的文化传统”(韦勒克 11)。而就“白话”词语本身就是一个有意味的概念,如前所述,鲍曼认为“言说艺术”好于“口头文学”的表述,是因为言说本身就是一“在场”的行为,而“白话”中的“白”与“话”均有“说”的意义,类似于“言说”。而且,白话一如民间,指向的是特定的生活空间,即汉森所说的“日常生活”,以此观之,“白话”就不仅是一语言概念,因为白话本身就寓意民间。而且,较之“大众”“平民”等以阶层来区分的词语,“白话”更少意识形态的侵袭,更有其单纯性和合理性。同时,“白话”的术语也顺应了当下诸多人文学科日渐关注事实语境的发展态势,能为民间文学学科的阐释“提供更好的参照框架”,使“学术话语变得更加清晰”(理查德·鲍曼 5)。当然,“白话”作为一有史学意味的概念,在历史上有过重大影响,自有其特定语境给予它固化的含义,但正因为固化,而限制了生发的空间。这里对“白话”进行重新阐释,并不是想予以取代民间文学或其它的概念,而是想通过挖掘白话术语的内涵以为当下民间文学学科提供新的思考路径。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汉森提到的白话概念不仅与中国传统意义上以语言作为区分度的白话相距甚远,而且,她对白话所作的“日常生活”的理解也有其特定的指向,白话(包括诸多方言习语)的混杂性构成纷繁的话语形式,是与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和大规模毁灭的现代性结合在一起的,或更确切地说,“是与现代生活中物质、质体和感官层面”(张英进)相联系,这和我们理解的日常生活是对民间生活的一种判断还是很不一致的。由此,又提醒我们不论是对概念的输出还是输入,都应该进行重

新的认知和分析。

福柯曾说:“把影响、传统、文化连续性作为描述的单位是不妥当的,而内部一致性的、合理性的、演绎链和并存性的描述才是合理的单位”(3)。本文选取二十世纪初中国民间文学学科建构时期的三个关键词为切入点,结合史实判据,试图在挖掘学科原点合理内核的同时,能对当下学科的发展有所推进。

注释[Notes]

①英语中的“folklore”一词,有两重含义,它既是指作为研究对象的民俗,又是指研究民俗的学问,即“民俗学”。在作为研究对象的意义,它大多既包括神话、传说、歌谣等民间文学方面的内容,也包括风俗、习惯、仪式等其他民俗现象,因此,作为学科而言,folklore 所对应的中文概念应该是指“民俗学”。但是,从美国民俗学界的情况来看,由于在学科发展的主要阶段占统治地位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民间文学方面,因此,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惯常的理解中,folklore 都被看成了与中文“民间文学”相对应的一个概念。见于[美]理查德·鲍曼著,杨丽慧、安德明译:《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5,注释。

②王泉根在《学科级别:左右学术命运的指挥棒?》一文中曾谈及“民间文学”很尴尬的学科归属问题:1997年《教育部目录》公布实施以来,民间文学已不再由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管辖,而是归属到了社会学一级学科门下,在社会学一级学科门下的民俗学二级学科中,加一括号,注明“含民间文学”,成为民俗学下面的一个小的部分。参见《中华读书报》2007年7月4日。

③这里强调“主观上”,是因为胡适虽在主观上强调民间文学的文学属性,但受制于他的“历史癖”和“考据癖”,使他在具体实践中,常常偏离文学的轨道,而滑入到民俗学的研究范畴。相关论述可见拙作《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7年)154-55。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肯普·巴特尔:“著名美国民间文学·序”,顾兴梁译,《当代外国文学》1(1998):173-75。

[Battle, Kemp. "Preface to *Great American Folklore*." Trans. Gu Xingliang. *Contemporary Foreign Literature* 1 (1998): 173-75.]

理查德·鲍曼:《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杨丽慧,安德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Bauman, Richard. *Verbal Art as Performance*. Trans. Yang Lihui and An Deming. Guilin: Guangxi Normal Univer-

- sity Press, 2008.]
- 玛丽·艾伦·布朗：“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李扬译，《民间文化论坛》4(2004):87-91。
- [Brown, Mary Allen. “Folk Literature and Writer Literature”. Trans. Li Yang. *Folk Culture Forum* 4 (2004): 87-91.]
- 陈泳超：《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 [Chen, Yongchao. *Modern Trajectory of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Research*.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 陈友康：“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河北学刊》，1(2009):105-08。
- [Chen, Youkang. “The Practical Problems and Future Solutions about Chinese Folk Literature Studies.” *Hebei Academic Journal* 1 (2009): 105-108]
- 雅克·德里达：《解构与思想的未来》，夏可君等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
- [Derrida, Jacques. *Deconstruction and the Future of Thought in Derrida*. Trans. Xia Kejun.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6.]
- 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Foucault, Michel.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 Xie Qiang and Ma Yu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顾颉刚 吴立模：“苏州唱本叙录”，《民俗学集镌》第一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
- [Gu, Jiegang, and Wu Limo. “Suzhou Libretto Descriptive Catalogue.” *Folklore Collections*. Vol. 1.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1989.]
- 米莲姆·布拉图·汉森：“堕落女性，再升明星，新的视野：试论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上海无声电影”，包卫红译，《当代电影》1(2004):44-51。
- [Hansen, Miriam Bratu. “Fallen Women, Rising Star, New Horizons: On Shanghai Silent Film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Trans. Bao Weihong. *Modern Movie* 1 (2004): 44-51.]
- ：“大批量生产的感受：作为白话现代主义的经典电影”，刘宇清、杨静琳译，《电影艺术》5(2009):125-32。
- [———. “Feelings of Mass Production: Classical Movies as Vernacular Modernism.” Trans. Liu Yuqing and Yang Jinglin. *Movie Art* 5 (2009): 125-32.]
-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
- [Heidegger, Martin. *Being and Time*. Trans. Chen Jiaying and Wang Qingjie.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 胡适：《胡适全集》，44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
- [Hu, Shih. *The Complete Works of Hu Shih*. Vols. 44.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7.]
- 埃德蒙德·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 [Husserl, Edmund. *Philosophy as a Strict Science*. Trans. Ni Liangka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7.]
- 胡愈之：“论民间文学”，《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民俗理论卷》，苑利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 [Hu, Yuzhi. “On Folk Literature.” *20th Century Chinese Folklore Classics: The Volume of Folk Theory*. Ed. Yuan Li. Beijing: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Press, 2002.]
- 江帆：“困惑与忧虑：民间文艺学归属何处”，《中国艺术报》，2011年06月20日：8版。
- [Jiang, Fan. “Confusion and Anxiety: Where Is the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Going to?” *Chinese Art Journal* 20 June 2011: 8]
- 李川：“民间文学观照下的本土文化传统——《中国古代民间故事类型研究》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8年7月31日：10版。
- [Li, Chuan. “The Native Culture Tradi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Folk Literature: After Reading *Study on the Type of Ancient Chinese Folk Tales*.” *Journal of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Institute* 31 July 2008: 10]
- 刘半农：《国外民歌译》。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
- [Liu, Bannong. *Translation of Foreign Folk Songs*. Beijing: Beijing New Bookstore, 1927.]
- 刘复：“通俗小说之积极教训与消极教训”，《北京大学日刊》1. 10(1918):1-10。
- [Liu, Fu. “Positive and Negative Lessons from Popular Fiction.” *Peking University Daily* 1. 10 (1918): 1-10.]
- 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实验时代》，王铭铭、蓝达居译。北京：生活·读者·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
- [Marcus, George E., and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Trans. Wang Mingming and Lan Daju.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1998.]
- 爱德华·W·赛义德：《赛义德自选集》，谢少波、韩刚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 [Said, Edward W.. *Said Essays Self-Selected*. Trans. Xie Shaobo, et al. Beijing: Chinese Social Science Press,

1999.]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赖立里、郭英剑主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Spivak, Gayatri C. . *From Deconstr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Globalization: A Spivak Reader*. Eds. Cheng Yongguo,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勒内·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向愚、邢培明、陈圣生、李哲明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Wellek, René, and Austin Warren. *Theory of Literature*. Trans. Liu Xiangyu, et al.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ress, 20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恩格斯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Selected Works of Marx and Engels*. Vol. 4. Comp. and Trans.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arx Lenin Engels and Stalin Works Bureau.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5.]

康斯坦丁·冯·巴洛文编著:《智慧书》,陈卉、邓岚、林婷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

[von Barloewen, Constantin, ed. *Wisdom Book*. Trans. Chen Hui, et al.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1.]

张隆溪:《道与逻各斯—东西方文学阐释学》,冯川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Zhang, Longxi. *The Tao and the Logos: Hermeneutics, East and West*. Trans. Feng Chuan. Nanjing: Jiangsu Education Press, 2006.]

张英进:“阅读早期电影理论:集体感官机制与白话现代主义”,《当代电影》1(2005):29-34。

[Zhang, Yingjin. “Reading Early Film Theories: The Collective Sensory Mechanisms and Vernacular Modernism.” *Modern Movie* 1 (2005): 29-34]

钟敬文:《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主编季羨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Zhong, Jingwen. *Study of Folk Literature and Its History: Self-selected Essays of Zhong Jingwen*. Eds. Ji Xianlin, et al. Ji'nan: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8.]

周作人:《周作人民俗学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

[Zhou, Zuoren. *Zhou Zuoren's Essays on Folklore*. Shanghai: Shanghai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1999.]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

[- - -. *The Origins of Chinese New Literature*.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s Press, 2007.]

宗白华:《美学散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Zong, Baihua. *Strolling in Aesthetics*.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ress, 2007.]

(责任编辑:王嘉军)

